

近代日本宪政党内阁研究

陈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 宪政党内阁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以本届内阁为转折点, 在此之前持续的萨长藩阀交替执政的政权模式宣告终结。作为近代日本政党内阁的首度尝试, 宪政党内阁时期出现了猎官、内部倾轧、与藩阀势力妥协等一系列负面现象。由于宪政党内阁是由藩阀开明势力的代表——元老伊藤博文推荐产生, 而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诸元老鉴于当时藩阀政府难以掌控政权, 故被迫在表面上同意宪政党组阁。因此, 无论是在宪政党最初组阁还是在其施政过程中, 都受到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元老、官僚、贵族院、军部势力的掣肘, 加之宪政党内部的明争暗斗, 由此导致了宪政党分裂和宪政党内阁瓦解。

关键词: 日本宪政党; 宪政党内阁; 藩阀政府

中图分类号: K313.4; D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6)03-0049-08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6.03.006

前言

中日甲午战后, 日本中央政局发生变动, 由藩阀政府^①与众议院中政党冲突为主向双方合作为主转变。自由党改变初期议会时期对抗藩阀政府的姿态, 转而支持藩阀政府提出的“战后经营”计划, 藩阀元老伊藤博文也开始抛弃“超然主义”理念与自由党展开合作以图推行“战后经营”。由此开启了藩阀政府与政党联合执政的滥觞。

1898年1月, 第3届伊藤博文内阁成立, 相继与进步党和自由党商讨合作, 因官职要求双方无法达成一致, 未能实现。于是, 伊藤博文被迫建立了以伊藤系官僚为核心的超然内阁。其后, 面对自由党和进步党的联合对抗态势, 伊藤博文被迫解散

了第12届议会。随即, 1898年6月30日, 宪政党内阁诞生, 但其仅维持了124天的短暂生命便宣告结束。宪政党内阁存在时间虽很短促, 然其在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作为近代日本首届政党内阁来说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据笔者所知, 国内学界尚无有关宪政党内阁的专门论述, 只是在一些研究近代日本政党或政党政治的论文中略有涉及^{[1][2]}。鉴于此, 文章拟通过自宪政党成立、宪政党组阁、宪政党内阁施政至宪政党分裂和宪政党内阁瓦解的历史性考察, 对宪政党内阁做一探讨和分析。

一、宪政党成立

1898年6月10日, 由于第3届伊藤内阁与由

收稿日期: 2015-12-01

作者简介: 陈伟(1969—), 男, 河北保定人, 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近代日本政治史、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① 藩阀是指在倒幕维新过程中立下功勋, 并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居于中枢地位的极少数旧萨摩、长州二藩的中下级武士出身的军阀与官僚集团。他们通过被授予“元勋优遇”特权和奉诏“匡辅大政”, 组成超越宪法之外的以伊藤博文为核心的元老集团, 负责国家最高决策和推荐继任首相。第一代元老集团成员除伊藤之外, 还包括与其同样出身于长州藩的山县有朋、井上馨以及出身于萨摩藩的黑田清隆、松方正义、西乡从道、大山岩。由他们所组成的政府被时人称为藩阀政府。

自由党、进步党组成的反对党围绕地租增征案发生冲突，第12届议会被解散。解散议会促成了在此之前一向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由党和进步党相互接近、联合对抗藩阀政府的态势。在此之时，担任居中联系之责的是进步党的平冈浩太郎。平冈在第12届议会召开之时，目睹自由、进步两党互相对立，藩阀从中坐收渔人之利，深感“不若此际说服两党领袖，抛弃旧来之感情，谋求相同主义者的一大联合，堂堂正正与藩阀决其雌雄”^{[3]790}。其时适逢与自由党领袖杉田定一相遇。两人是二十年前的旧友，都参与过重建爱国社、组织国会期成同盟等自由民权运动。之后平冈在九州经营煤矿，积累了巨万之资，杉田则加入自由党，在政界从事活动。1894年，平冈在福冈被选为众议院议员，重新步入政界。平冈在与杉田会面时，要求杉田帮助召集昔时故交，杉田慨然允诺。

1898年6月3日，在平冈府邸召开故交会，参加者有杉田定一、河野广中、平冈浩太郎等自由、进步两党领袖。在聚会时，平冈表示要：“联合相同主张者以共同应对局势”^{[3]792}。6月7日，两党数名领袖在平冈府邸聚会，约定两党应该共同合作。议会解散（6月10日）之夜，犬养毅、杉田定一等诸人在平冈府邸聚会，确定了两党联合建议。

6月11日，在在野联合联谊会上，片冈健吉公布合作条件，由自由党的栗原亮一、进步党的竹内正志负责起草宣言及党纲。6月13日夜，组织新政党的筹备会议在楠木正隆府邸召开，商讨由栗原亮一和竹内正志起草的新政党宣言及党纲，并进行修改。出席会议的有进步党的尾崎行雄、竹内正志等六人，自由党的松田正久、林有造等六人和山下俱乐部的平冈浩太郎及同志俱乐部的河野广中。

6月15日，新政党创立委员林有造、松田正久等人拜访大隈，恳请其加入新政党。大隈慨然允诺，表示：“必定出席于16日在中村楼召开的两党联合的大联谊会”^{[4]288}。板垣退助也向楠木正隆、尾崎行雄表达了与大隈相同的心愿，表示要尽自己绵薄之力。

6月16日，在江东中村楼召开民党联合大联谊会，包括自由党党首板垣和进步党党首大隈，进

步、自由两党党员达七八百名^{[4]289}。自由民权运动以来，本次联谊会首度实现了民党大联合。大隈和板垣分别发表演讲，阐述民党联合的意义。两人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两党党员的士气。

自由党的片冈健吉、西山志澄、松田正久、杉田定一、栗原亮一、中岛又五郎、谷河尚忠、冈崎邦辅、志波三九郎、改野耕三，进步党的大石正巳、尾崎行雄、大东义彻、鸠山和夫、柴四郎、武富时敏、岛田三郎、楠木正隆、菊池九郎、中村弥六、竹内正志及其他各派的园山勇、田口卯吉、长谷场纯孝、河野广中、平冈浩太郎被选为创立委员，处理关于新政党创立的一切有关事务，6月18日，会聚于工业俱乐部，确定新党成立仪式筹备委员，又起草党则草案。筹备委员有尾崎行雄、杉田定一、栗原亮一、竹内正志、中岛又五郎。

6月21日，自由、进步两党各自召开临时大会宣布解党。22日，新政党在新富座举行成立仪式。关于党名，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定名为宪政党。当日出席者总数约达2000人^{[3]797}。当日，片冈健吉被推举为会长，平冈浩太郎发表致词。接着，创立委员鸠山和夫发表演说，阐述新党方针，强调：“我们对于藩阀政府采取的方针只有两条。其一，以我党之组织，彼等唯有丧魂落魄必定开城逃走，我党可进入空城占领之。其二，政府若拒绝，并非柔顺让渡城池的话，我党唯有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夺取之。”^{[3]797}其自信之气慨跃然纸上。同日，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被选为党首。当日还通过了宣言书和党纲。诸项议事结束之后，会长片冈推荐大东义彻、尾崎行雄、松田正久、林有造为总务委员，并获全会通过。最后，片冈指定箕浦胜人、栗原亮一、竹内正志、伊藤大八、隆旗元太郎为干事后宣布散会。

宪政党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重要性在于日本政党内阁制度的开端始于以宪政党为基础组建的宪政党内阁。宪政党成立是当时政党势力强大带来的必然结果。作为明治宪政史上令人关注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宪政党的出现是由于政党与藩阀合作关系屡遭失败之后，政党觉醒后采取的一种自救手段。而旨在以夺取藩阀政府权力和建立政党内阁制度为目标的宪政党，对于藩阀

势力形成巨大挑战，使得当时的伊藤内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二、宪政党内阁诞生

以山县有朋为首的山县系官僚派面对众议院中出现的一大反对党——宪政党，提出了非妥协的强硬对策——停止宪法论。伊藤博文坚决反对山县系官僚派提出的强硬主张，认为停止宪法违反立宪政治的本义。在6月24日和6月25日连续两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伊藤主动要求辞去首相职务，确信“奏请在议会拥有大多数议员的新党领袖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组阁才符合宪政之本义”^{[5]379}。山县有朋虽反对大隈、板垣组阁，但因包括自己在内的诸元老无人愿意继任首相，故诸元老被迫一致上奏天皇，奏请大隈、板垣组阁。这样，藩阀政府终于交出了政权，以宪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于6月30日正式诞生，本届内阁也标志着政界横断——民党联合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标志日本政党内阁的开端。宪法颁布、议会开设近十年之久，一直作为藩阀政府反对党的前民党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建立了政党内阁。在内阁十个职位中，外相由首相大隈亲自兼任，内阁人数为九人。占据陆海军两相职位的两人，虽然属于藩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但其他七人皆为政党党员。由于军权直属于天皇，所以作为军权在阁内代表的陆海军大臣作为官职上的特殊职位，加上以藩阀巨头山县为代表的藩阀势力强调“至少要使陆海两省超越于党派之外”^{[6]322}，都使得大隈在组阁之时颇为棘手。最终，由伊藤从中进行斡旋，明治天皇召见海军大臣西乡从道、陆军大臣桂太郎，颁布诏敕予以留任。

应该看到的是，宪政党内阁的成立并不是由于政党的自身发展、宪法的逐步完善而自然导致的结果。其成立的直接原因源于两次事件：其一，6月22日，自由、进步两党联合建立宪政党。其二，6月25日，伊藤因自己组党计划受挫而被迫放弃组党。催生宪政党内阁的根源来自于藩阀元老伊藤，是通过伊藤凭借自己深受天皇信任、在政界的巨大号召力和其个人能力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伊藤充分认识到藩阀势力的衰退已不可避免，为了

完成战后经营计划，在议会实现有效的施政运作，站在实现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贯坚持的国是的立场，才决定向天皇奏荐宪政党组阁。因此，宪政党内阁的诞生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在与藩阀政府的较量斗争中取得的，而是依靠外力的推动，其自身基础从开始就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脆弱性。

另外，其作为政党内阁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局限性，“只能称之为不完全的政党内阁”^{[2]43}。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陆海军大臣是以天皇颁布敕令以上届内阁的陆海军大臣留任形式实现人选确定。同时，海相西乡和陆相桂也秉承山县意愿，在宪政党内阁举行亲任式之前，会见大隈、板垣，桂和西乡从与大隈的谈话中取得内阁对军备扩张计划的承诺，才答应留任。内阁成立伊始，桂就用带有几分嘲讽意味的语气对于宪政党内阁的性质评价道：“本度成立的内阁，彼等政党者流虽自称为政党内阁，然以我之见解，此内阁难以称为以政党为基础之内阁。这是什么原因呢？譬如陆海军大臣，以政党以外之人担任，这可说是缺少作为政党之基础的全体活动，只是半身不遂之内阁而已。”^{[7]796}

同时，宪政党内部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宪政党只是为了推翻藩阀政府组成的反对党大联合，内部统一尚未实现，加之自由、进步两派一向对立，结党和组阁时间都极为短促，在人员和感情上未实现有效融和，故其合并只是形式上的，内部依然分为自由派和进步派两个派系。为此，只有保持两派的势力均衡，才可以维系内阁统一。但从组阁之初在内阁职位分配上两派之间就不平衡。除陆海军大臣之外的内阁八个职位中，进步派占据五个职位，而自由派仅有三个职位。当时自由派内部有三大派系：土佐派、九州派、关东派，内阁中三个职位包括土佐派的板垣、林有造和九州派的松田正久，而以星亨为代表的关东派却无一职位。大隈强调给予自由派的职位数量虽少，但职位皆为内相、藏相、邮政相等重要职位。然而，自由派却主张阁僚人选应该平均分配，而且目标直接指向了大隈兼任的外相一职，由此埋下了内阁分裂的火种，致使其后爆发了下文所述的围绕外相专任问题产生的阁僚均势事件。

但无可否认，宪政党内阁的成立，确是自明治

政府成立以来政界一大巨变，其出现自然引起了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元老、官僚和贵族院的强烈恐惧和反感。因此，藩阀巨头山县才不禁发出哀叹：“本朝政海发生一大变动。明治政府终于城池陷落，……败兵之老将再无谈兵之必要，唯有隐退，别无他途。”^{[6]319} 萨摩元老松方在组织第2届内阁之时，虽然和进步党合作推行了新闻纸条例的修订等诸项政治改革，但自从其与进步党的合作断绝、导致内阁解体以来，即对进步党一直不满，且开始对政党抱有强烈敌意。另外，警视总监园田安贤在宪政党内阁成立不久，即辞职表示抗议。作为官僚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都筑馨六也发布《告贵族院诸公书》，以由于宪政党内阁的上台，导致官僚和政党之间围绕争夺政权的对立日趋激化为理由，呼吁贵族院打倒本届内阁。所谓围绕政权的官僚和政党的对立激化，即是下文所述的宪政党党员的猎官现象。山县系官僚野村靖在6月29日以政党内阁误国为由，上奏天皇。野村在上奏文中强调：“今日之称为政党者，多为失意不平之徒为谋求其一身或一地方之私利而相聚集，……今不幸政党内阁组织，然唯以私利私意离合之党员，永难担当政务之大任，早晚必生纷争，自己溃败已是洞若观火。”^{[8]461-462} 在贵族院，以茶话会的平田东助、研究会的清浦奎吾等山县系官僚为首的诸势力频繁活动，积极准备在第13届议会上采取倒阁行动。

总之，作为近代日本首届政党内阁的宪政党内阁，在其诞生之初，即处于元老、官僚、贵族院、军部等诸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加上其内部蕴涵的种种矛盾，其前途之凶险可想而知。

三、宪政党内阁施政

1898年7月5日，大隈首相在地方官会议上，发表训示演说。他首先明确指出新内阁与超然内阁的不同点，表示：“本届内阁更迭与过去政变相比，意义大为不同。传统上内阁不允许阁臣为政党党员，但与此相反，现内阁几乎是由纯然的政党党员所组织，此际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引起世人的疑惑。而时世之进步促进我国组织政党内阁者，上一意鞅掌国务，此内阁未来希望之所在。”^{[3]815} 特别

强调了政党内阁诞生的深远意义。其次，大隈就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强调：“既然作为政党内阁，政务官应以和吾人同志者之政党党员举荐，而事务官与政务官责任义务不同，要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避免进行无用之更迭以致产生事务阻滞。作为事务官不奉上官之命只要不妨碍政务则不会随便进行更迭。”^{[3]815} 这里大隈指出的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是指内阁可以自由任用的敕任官和文官任用令中规定的设有资格限制的委任以下之间的区别。但大隈提出的这一方针对于希望进一步严格执行文官任用令的官僚派和与此相反、期望全部废除文官任用令以实现全部官职的自由任用的宪政党员来说，都不能得到满足。其中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宪政党员的猎官要求，如蔓延之势不可阻挡。虽然，大隈一直主张严格区别政务官与事务官，且曾一度明确表示要保证事务官的地位，但此时，为了应付党内日益激烈的猎官热，连事务官也不能幸免，以致演出了“失去饭碗的官员，行尸累累，辗转奔走于中央和地方的大惨剧”^{[9]318}。

当时，宪政党的猎官对象不仅涉及各道府县厅的知事，而且也波及下层官吏。宪政党员担任除内阁大臣之外的高等官——敕任官、委任官的高级官僚人数至宪政党内阁瓦解前已达36人^{[10]181}。从传统意义上说，帝国大学毕业生是培养政府高级官僚的专门机构，政党党员大规模的猎官行动势必会引起其群体对于政党的强烈反感。而“对于猎官的过热批评，也会限制内阁分配给政党党员的职位，致使党内的职位争夺日趋激烈”^{[11]141}。

为了实行政治整理，宪政党设立临时政务调查局，由内务大臣板垣担任委员长，政党出身的内阁书记长官、法制局长官及次官、局长等担任委员，着手实行政治整理。由于自由、进步两派之间意见难以统一导致调查未能顺利进行，迁延数月之后，才制定方案。结果，仅减少官吏定员4522名，减少俸禄74万日元^{[3]816}。而对陆海军两省，基本上未加裁减。从中再一次反映出宪政党的内部纠纷和对于藩阀势力的软弱和妥协性。大隈在公布修改官制的同时，又提出了官治标准10条。但如上改革不过是细枝末节的改革，并不能满足国民对于政党内阁的巨大期待，也不能实现对于行政制度的根本

改革，以此打破藩阀政治的积弊^{[3]817}。

在宪政党内阁实施的行政整理工作以失败告终的同时，另外一个重大课题即地租增征问题也困扰着政党内阁。由于伊藤博文希望在众议院拥有多数议席的本届内阁促成作为战后经营不可缺少的地租增征法案的成立，而这也是其他元老的共同愿望，宪政党不能无视诸元老的要求。同时，与其身为在野党时不同，作为执政党的宪政党为了完成国家既定的战后经营方针，就必须提出地租增征法案。另外，虽然大隈内阁是以提倡反对地租增征的宪政党为执政党组成的内阁，但由于桂陆相和西乡海相根据救命留任，其条件就是沿袭既定的军备扩张计划方针，故也不能回避提出地租增征法案。虽然，松田正久藏相自组阁之后，就一直回避地租增征，采取了增加酒税、提高烟草专卖价格、引进砂糖消费税等措施。但由于难以抑制军备扩张，故财政规模也无法缩小，致使政党内阁不得不走上了增征之途。

宪政党内阁在编制明治 32 年度（1899 年度）预算案之时，同样也没有体现出政党内阁与藩阀政府的不同之处。连续两次召开阁议讨论陆海军预算问题，桂陆相和西乡海相坚持不肯放弃削减，最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桂太郎稍许让步，才艰难地通过包括陆海军预算在内的政府预算案。面临破裂之局才得以通过的预算案究竟和此前藩阀政府的预算案存在多大差异呢？当时，身为大藏次官、负责宪政党内阁编制预算案的添田寿一，在内阁瓦解后公布的《明治 32 年度预算的财政经济方针》中指出：“经宪政党内阁之手制定的明治 32 年度预算，虽然致力于节约，但在经费之上未实现巨额削减，此诚为遗憾之事。而其金额高达 2 亿 3 000 余万日元”^{[10]192}，明确指出年度支出膨胀在政党内阁下亦为不可阻挡之趋势。其最大原因在于陆海军扩军费用，军事费用高达 1 亿日元^{[10]192}。经过宪政党阁议决定的预算案，被其后的第 2 届山县内阁继承。换句话说，由政党组阁的宪政党内阁编制的预算案，被作为藩阀政府的第 2 届山县内阁原封不动地予以采纳。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在以陆海扩军为中心的战后经营计划上，藩阀和政党之间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宪政党内阁提出的地租增征案和预算

案都未及送交议会进行讨论，就陷于瓦解，这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总之，由于宪政党内阁的财政计划是以地租增征为前提，是在牺牲普通国民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的，与这之前藩阀政府制定的财政计划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没有凸现出其作为政党内阁的财政计划的不同之处，从而使自己在国民中的信任度大为降低，严重地削弱了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四、宪政党分裂与宪政党内阁瓦解

由伊藤内阁解散议会而举行的第 6 次众议院议员大选于 1898 年 8 月 10 日举行，当日大选基本上保持平稳。大选结果，宪政党在总数 300 名议员中，占有 260 名。^{[3]818} 由于宪政党在众议院中占有议员总数 87% 的绝对多数，出现了自议会开设以来单独政党在众议院占据绝对多数的局面，宪政气势极为高涨。但大选一俟结束，宪政党内阁内部因外相专任问题，就爆发了所谓阁僚均势事件，引起了宪政党内部的激烈内讧。

如前文所述，内阁阁僚中进步派四人，自由派三人，大臣职位上进步派多于自由派。大选结束，板垣即要求大隈辞去其兼任的外相职务，推荐星亨为继任外相。由于大选结果，进步派席位比自由派席位多 15 席，大隈认为进步派占据优势，故没有必要将外相让于自由派，对此持消极态度。恰当此时，8 月 15 日，驻美国全权公使星亨归国。星亨的不待命令、突然归国之举，进一步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极大地激化了宪政党内本已激烈的自由派和进步派之间的纷争。星亨自担任众议院议长时起，就一贯反对改进党，并且排斥民党联合论，希望通过由自由党单独实现与藩阀政府的合作最终建立政党政治。为此，其在美国自然不会由进步派主导的政党内阁的出现熟视无睹。如前所述，当时前自由党（自由派）内部土佐派、九州派、关东派三足鼎立，土佐派、九州派均有阁僚入阁，唯独关东派无一人入阁，因此，关东派极力要求星亨担任外相。加之板垣从自由派和改进派阁僚均衡的立场出发，在关东派的强烈要求下，再一次向大隈要求星亨担任外相。大隈反对，两人互不相

让。大隈建议星亨入阁问题要事先取得陆海两相的谅解，板垣也表示同意。

最初在宪政党组阁之时，西乡海相就对桂太郎说道：“自由进步两派之分裂为期不远矣。其时，进步派会到我处要求援助，自由派会到阁下处，乞求声援。”^{[7]796}果如西乡所料，至此终于出现政党内阁请求正在寻找倒阁时机的军部大臣提供支持的奇怪现象。桂察觉大隈、板垣两人之间的矛盾，预想外相问题势必会导致宪政党内部的分歧加剧，感到两派分裂时机逐渐临近，此时唯有以静制动、待时而动。由于大隈和陆海军大臣的坚决反对，星亨担任外相一事终于化为泡影，而两派之间的倾轧也日趋激烈。失去外相之任的星亨暗自展开了一系列瓦解内阁的行动。正当星亨寻找倒阁时机之际，尾崎文相的“共和演说”事件给了自由派攻击进步派的最佳时机，同时也成为内阁瓦解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

8月22日，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帝国教育会上，发表演说，在抨击拜金主义之时，强调：“不要担心，日本不会实行共和政治，纵使经过千万年，也绝不实行共和政治。为了便于说明，假如在日本梦见共和政治，那么请看吧，三井、三菱大概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吧。”^{[3]824-825}尾崎的本意并非希望日本实行共和政体，而是有感于其时日本社会拜金主义风潮甚嚣尘上，以三井、三菱也许会成为总统候选人作为事例来抨击当时实业家操纵政治的丑恶现象。但尾崎演说一经传开，由伊藤系官僚伊东巳代治经营的御用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即攻击其演说蔑视天皇，言语极端不敬，不适合担任辅弼大臣。而枢密院、贵族院及宫廷也将弹劾矛头指向尾崎，枢密院中的鸟尾小弥太、贵族院中的平田东助、清浦奎吾、千家尊福等人皆联合抨击尾崎演说。自由派因在阁僚均势问题上遭遇失败，对于大隈的进步派极端不满，正逢此时机，遂与其他势力联合攻击尾崎演说。而一直待时而动的桂陆相终于寻找到倒阁时机，于是向大隈提出警告，尾崎应立即参见天皇谢罪。大隈劝说尾崎，并告知桂的意见。尾崎听从大隈劝告，于9月6日参见天皇谢

罪，但并未言及辞职。10月23日，桂太郎在致山县的信中强调尾崎辞职“将成为导火索，终将导致全体^①之瓦解”^{[12]309}，并指出“为帝国考虑，宪政党内阁不如及早下台反而幸福”^{[12]309}，公开表示了其倒阁的明确态度。24日，尾崎文相被迫提出辞表。同时，贵族院方面也在积极地进行倒阁的相关准备，山县系官僚、贵族院中最大派系研究会领袖清浦奎吾在10月26日致山县的信中表示，“贵族院也逐渐开展大团结、大打击的计划”^{[6]330}。

尾崎辞职之后，围绕继任文相，自由派和进步派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进步派主张既然是自己派系的党员出缺，后继人选应从自己派系中推荐。自由派从阁僚均势上考虑，主张应从自己派系中进行推荐才至为妥当。25日和26日，连续召开两次阁议，两派未就文相后继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大隈单独上奏推荐犬养毅为文相，翌日举行亲任仪式。在27日举行犬养文相亲任仪式之前，板垣参见天皇详细陈述阁议经过，并弹劾大隈独断专行，指出犬养不适合担任文相，如果任命犬养为文相，自己和松田、林有造两大臣唯有辞职。28日，大隈拜访桂太郎，要求其予以谅解。桂反而强烈要求大隈辞职。自由派愤于大隈的专断行为，遂开始了内阁破坏运动。而作为运动的指挥者即是星亨，星亨一手操纵的宪政党解党事件拉开了自由派破坏运动的序幕。

10月28日，星亨以宪政党本部名义发出召开临时协议会的通知。29日，召开自由派所属党员会议，并将协议会改为大会，通过宪政党解散决议，宣布重组宪政党，选举总务委员及其他干部，通过党纲及党则，并向警视厅申办手续。由于警视总监西山志澄为自由派党员，秉承板垣内相意旨，迅速予以批准。同时，自由派占领宪政党本部，部署警备人员，禁止进步派进入。由自由派和进步派联合组成的宪政党事实上已经陷入分裂状态。对此，进步派针锋相对，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表示10月29日由自由派通过的宪政党决议无效。并于11月1日，召开宪政党大会，推举河野广中为议长。由于已经获悉警视厅会发出解散会议的命

① 全体指宪政党内阁。

令，故在收到解散命令之前，迅速通过决议，制定会议方法，修改党则，选举干部。至此，宪政党一分为二，出现了同一党名的两个政党并立的非正常状态。警视总监西山志澄以宪政党已经解体为由，向进步派大会发出解散命令。²日，板垣内相向进步派的宪政党发出命令书，禁止其存在。进步派知道难以挽回宪政党名称已为自由派领先占有的大势，遂经过协商，放弃宪政党名称，召开大会，再次推选总务委员、评议委员干事，并通过宣言书，重新命名为宪政本党。至此，宪政党正式分裂为由自由派组成的宪政党和由进步派组成的宪政本党，联合仅半年的宪政党又恢复了分裂状态。

宪政党在分裂的同时，以宪政党为基础的宪政党内阁也被迫瓦解。10月29日，内相板垣提出辞表，松田、林有造也相继提出辞表，其他自由派出身的次官、局长等也相继上表辞职。大隈认为既然板垣等自由派提出辞表，则可有希望实现进步派独立内阁，并期待天皇诏敕下达。大隈和大石正巳农商务相联合上奏内阁不统一的现实状况，指出板垣等自由派提出辞表是无法避免之事，希望由自己推荐后继阁僚。但天皇表示由于最初组织内阁的大命是向大隈、板垣两人下达，现在板垣既已辞职，势难由大隈组织单独内阁。同时，以山县为代表的诸元老也期望大隈内阁早日倒台，10月30日，西乡海相向大隈劝告其应立即辞职。至此，大隈终于感觉很难建立由进步派组织的一党内阁，遂于31日，和大石、犬养等进步派诸大臣联合向天皇提出辞表，并获许可。

宪政党内阁于6月30日成立，10月31日倒台，仅仅存在124天。近代日本首届政党内阁虽然在众议院300议席中拥有260议席的压倒多数，但由于内部分裂和山县系的巨大压力，终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其结果，宣告自初期议会以来一直在民党中抱有幻想的民党大联合的路线终于破灭，从中暴露了民党联合纽带的脆弱性。此后，两派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自由派恢复了以星亨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并适应形势进行政党重组，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并在1900年以自身为基础加入了伊藤博文组建的政友会，开始了自身新的发展阶段。而进步派一直到1913年参加桂太郎

组织的立宪同志会，始终未能形成适应时代需求的稳定的政治理念和党的组织，经历了长期低迷时期。

结 语

综上所述，作为近代日本首届政党内阁，宪政党内阁如昙花一现，未过一届议会即匆匆落幕，但不可否认，宪政党内阁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以本届内阁为转折点，在此之前持续的萨长藩阀交替执政的政权模式宣告终结。这一模式的终结，从当时广泛的社会背景来说，也是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趋势使然，旧有的落后的由萨长藩阀垄断的独裁政权，很难适应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一个更能代表其利益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政权。当然，在宪政党内阁之后还出现了以长州藩阀山县有朋为首相的内阁，但这届山县内阁与这之前的旧有的藩阀内阁的性质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山县与政党合作是在政治纲领上接受政党的主张。不管山县的个人主观目的如何，其客观作用起到的是更进一步地引导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为日本近代史上首度出现的政党内阁，宪政党内阁时期出现了猎官、内部倾轧、与藩阀势力妥协等一系列负面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政党本身的不成熟、自身缺乏团结、相当程度的软弱和妥协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藩阀势力依旧强大，政党势力还未强大到可以超越藩阀势力而自主施政的地步，这一点从政党内阁的诞生并非依靠自身实力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当时藩阀开明势力的代表——元老伊藤博文推荐组阁也可推知。正是由于宪政党内阁是由伊藤博文推荐产生，而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诸元老鉴于当时藩阀政府难以掌控政权，故被迫在表面上同意宪政党组阁。因此，无论是在宪政党最初组阁还是在其施政过程中，都受到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元老、官僚、贵族院、军部势力的掣肘，加之宪政党内部的明争暗斗，作为不幸的早产儿，宪政党失败的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作为近代日本政党内阁的首度尝

试, 宪政党内阁的出现和消亡虽很短促, 却给后世遗留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参 考 文 献]

- [1] 解晓东. 战前日本政党政治进程探讨 [J]. 锦州师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2).
- [2] 肖爱民. 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研究之二 [J]. 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3).
- [3] 大津淳一郎. 大日本宪政史 (第4卷) [M]. 东京: 原书房, 1970.
- [4] 大隈侯八十五年史编纂会. 大隈侯八十五年史 (第二卷) [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70.
- [5] 春畝公追頌会. 伊藤博文伝 (下卷) [M]. 东京: 原书房, 1970.
- [6] 德富蘇峰. 公爵山縣有朋伝 (下卷) [M]. 东京: 原书房, 1969.
- [7] 德富猪一郎. 公爵桂太郎伝 (乾卷) [M]. 东京: 故桂公爵記念事業会, 1917.
- [8] 宫内庁. 明治天皇紀 (第9卷) [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73.
- [9]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 (第3卷) [M]. 吕万和, 熊达云, 张健,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10] 坂野潤治. 明治憲法体制の確立——富国強兵と民力休養 [M]. 东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1.
- [11] 鈴木武史. 星亨 藩閥政府を揺るがした男 [M]. 东京: 中央公論社, 1988.
- [12]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会. 山縣有朋關係文書 (1) [M]. 东京: 山川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孙 丽]

Study on the Kenseito Cabinet of Modern Japan

CHEN Wei

(The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e Kenseito Cabinet is the beginning of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Japan,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the long-term governmental model of Satsuma and Choshu Hanbatsu's presidency rotation. As the first party cabinet of modern Japan, hunting office holder, having internal strife and compromising to Hanbatsuo occurred during Kenseito cabinet period. The Kenseito cabinet was set up on recommendation of the elder statesman Itō Hirobumi who was representative of enlightened force in Hanbatsu. The other elder statesmen led by Yamagata Aritomo had to agree with Kenseito to form a cabinet on the surface, because it was difficult for Hanbatsu government to control the regime. Therefore, the Kenseito cabinet was constrained by elder statesman, bureaucrats, Kizokuyin and Gunbu, among which Yamagata Aritomo was a representative man. There were internal disputes in Kenseito, all of which led to division of the Kenseito and collapse of Kenseito cabinet.

Key words: Kenseito; Kenseito cabinet; Hanbatsu